

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与时代新变

陈思和先生的新著《从广场到岗位》既是其学术生涯与知识分子精神史自述，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重新回顾新时期以来文学的历史发展脉络与知识构造的视野。在书中，陈思和将论述的起点设置于1993年的人文精神讨论，然后向前追溯至近现代以及更遥远的历史来思考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通过不断的自我剖析与对话，最终将思考投入对当代文学与生活的关照。陈思和先生始终自觉坚守在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的岗位上，与此同时，这种对于岗位意识的持守，又始终在更为广阔的人文学科乃至时代中发挥其作用。时代在变化，文学等人文学科也需要相应进行调整并给予回应，从具有岗位意识的学术研究到具有公共聚焦的人文关怀，都对知识分子提出了新要求。理解历史与知识思想，是为了更好地与当下的时代生活、学术研究进行对话。基于此，本期以陈思和先生这本新著为讨论契机，特邀王晓明、王鸿生、陈昶、吴天舟四位学者撰文，并对陈思和先生进行访谈，将讨论的话题延展开去，试图将视野进一步打开，激发历史与当下、学术研究与现实生活之间对话的活力，进而推动“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

——编者按

朝向“来自未来的眼光”

□ 王晓明，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

每一位学人的社会生命——相当数量的读者关注他的工作成果的时间——都是不同的，有的很短，有的较长。这其中的关键，除了他自己做得如何之外，还在于他遭遇了怎样的时代，他因此与前一两代人和后一两代人形成怎样的关系。

陈思和先生教书42年，写作的时间更长，他的教学生涯很快就要结束了，但他的写作不会就此结束，这本《从广场到岗位》^①就是证明：他在继续往前走，还远没有到做总结、画句号的时候。笔者在这里，主要不谈这本书的具体内容，而是要谈为什么思和会写这本书，或者说，他写这本书的意义。思和不是一个立马千言的人，据我所见，他的写作通常比较慢，但这本书却写得相当快，我想，除了他本人奋笔疾书之外，还有别的因素在起作用。其中之一，就是他所选择的精神参照的作用。在四十多年前开始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时候，他面临着一个选择：从什么方向或角度进入这个领域？或者更准确地说，进入这个领域的哪一个部分、哪一条脉络？现在回过头看，我觉得他的选择相当有意思。他首先选择了巴金，而且主要不是文学家的巴金，而是那个思想者的巴金，那个信奉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即便1950年代被任命为上海作家协会主席却坚持不领工资的巴金，那个晚年写出《随想录》，痛陈自己在“文革”和“文革”之前的软弱表现的巴金：他以这样一个巴金作为自己教师和学者生涯的起点，这非常重要。

① 参见陈思和：《从广场到岗位》，北京：文津出版社，2024年。





同样重要的是，他很快遇到了贾植芳先生，这是他的思想成长之路上的第二块重要的路标。经由贾先生这位虽经历坎坷却依然正直硬朗、爱憎分明的所谓“胡风分子”，他进一步接触到胡风，接触到了那个追求革命却自有品格，在20世纪50年代被恶称为“胡风集团”的知识分子和作家群体。经由对这个群体的了解，他更进一步走近“鲁迅”，不只是鲁迅笔下的世界，更是那个无论巴金还是贾植芳都愿意倾心追随的鲁迅，那个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鲁迅。

了解了他是以巴金—贾植芳—“胡风集团”—鲁迅这样一条线索，来构组自己思想与文学的主要参照，也就可以知道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为什么写得这么快，甚至为什么起这样一个毫不迂回的书名。从巴金到鲁迅，凡他所确认的这一条思想与文学脉络里的人物，都是共有这样一些精神品格的：热忱、固执、心火旺、骨头硬，不畏惧与现实搏斗，总是要有所贡献于社会的进步……一个人多年受教于这样的前辈，那无论其具体的境况、心志与前辈有多少不同，都是会潜移默化、有意无意地跟随仿效的。至少，他是不大容易懒散、颓唐、一过中年就感叹人生的残冬的。相反，只要有可能，他就会奋笔疾书，越是年纪大了，恐怕还越不耐烦欲言又止、吞吞吐吐，而要直抒胸臆、一吐为快。

在这个意义上，我是将这本书视为思和所确认的那条现代文学—思想脉络的一个新的产物，或者说，是这条脉络通过他对今天的思想和文化现实的一次认真的回应。

思和在学术上的贡献之一，是在中国现代文学——一定程度上也是在比较文学——的领域里，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关键词”。从20世纪80年代的“新文学整体观”和“战争文化心理”，到21世纪初对“世界性”概念的重新阐发，更不要说“民间”和“岗位”这样不断引发讨论的概念了，它们都是鲜明的例子。不过，他现在有意写六本书来梳理这些“关键词”，却恐怕不只是出于学术责任感，尽管这的确是他的一项责无旁贷的任务。他决意这么做，应该更是体现了一种长远的考虑：对于“来自未来的眼光”的自觉。

在我们这一代人——也可以说整个20世纪的好几代人——的时间感受中，最深切的就是对于世事多变的体验，几乎每隔一二十年，社会就会发生巨大的改变。不但很多此前大家觉得是非分明、理当如此的坚持，现在都被视为过于理想、应该抛弃的迂腐；甚至，更有很多此刻大家觉得势当如此，纷纷接受、无人质疑的做法，二十年后也会成为众矢之的，遭遇严厉的批判。随着平均寿命的持续增加，这一代人亲身承受下一代人——往往因标准大异而不留情面——审视的概率，是持续加大的。这就是我所说的“来自未来的眼光”。

把这样的“世事多变”放到较长的历史框架中来看，自然不是什么好事，它意味着中国人依然深陷于晚清以来的苦斗的历史，还很难走出“现代”这一特别的困境。不过，既然置身于如此境况，就只有尽我们所能，一面增强对于时代巨变的意识，避免陷入那种以为目前这样的“今天”将长久延续的错觉，一面减少在多变的局势中很容易膨胀的代际隔膜与误解，让思想和文化的积累得以继续。而要做到这些，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保持对于“来自未来的眼光”的自觉，说得夸张一点，我们现在的研究和写作不只有应对当下的一面，更有面对未来的一面。虽然很难说未来具体是什么时候，但可以肯定，我们这些年的所写所作，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经受“来自未来的眼光”的审视。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我们今天大部分的所写所为，对于当下的作用可能都很小，反而是对于未来——与那个“来自未来的眼光”的交流——的意义更大一些。

我经常用“小器化”来概括这几十年中国人的心智结构的变化，这个“小器化”的要点之一，就是只在意“此刻”，对过去缺乏尊重，对未来更是无感。这是相当糟糕的。如果一群人只是拱

在一起争来夺去，除了眼前的得失，别的都无感，那就可以肯定，这群人不会有未来。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特别要说，思和这本书的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那种对于“来自未来的眼光”的在意。不是写过说过就算了，而是在隔了一段时间之后，重新梳理自己的思想和学术历程，尽可能地将那些过去因为外部限制或自己认识不够而讲得不准确、不充分甚至不正确的地方，讲述清楚，梳理明白，让成形于当时之“今天”的学术和思想成果，获得面向此刻与未来的尽可能完整充分的表达。

在这里，我体会到的不只是一份自我反思的清醒，更是一种对于未来的尊重，一种对于学术和思想的代际积累与延续的希望。说到底，中国人面对的历史困难是如此巨大，如果一代一代的后人，都像我们在过去近百年间做过的那样，不断地误解和否定过往、从头开始，甚至不断地横起眼睛，以为有意义的历史从“我”这里才开始，那是绝对走不出困境的。

“未来”并不遥远，一旦你意识到来自未来的眼光正在逼近，“未来”也就在我们身边了。即便你对现实不抱希望，未来总是可以期待的，甚至是唯一可以期待的。从这个意义上，思和先生以这本书开始的工作，是我们这些同代人都应该做的。钱理群先生最近十年的著作是一个有力的提示，陈思和先生的这本书，也是一个同样醒目的提示。

在岗位上超越岗位

□ 王鸿生，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不知从何时起，陈思和教授萌生了这样的想法，计划用六本理论形态的回忆录，系统梳理自己的文学史研究关键词，阐释其话语创新意义，并反思性地追溯、展示和探讨自己的学术心路历程，“还历史一个说明，给当代一点启发”。

这显然是一个艰巨而别开生面的构想，相当于要把自己再写一遍，把一生跋涉过的学术道路再走一遍。对于一位文学史学者，重写自我的学术史，似乎比“重写文学史”更加困难而不好下手。每行一步，都将与自己既往的一系列论著构成复杂的互文关系，其中会有新的发现、自证、辨析、补充，也会有记忆误差、今昔龃龉、重释改写。尤其是人到晚年，没有足够的生命能量，没有持续的向内探索的勇气和执着，想要完成这样体量的工程是难以想象的。

“从心之年”七十伊始，陈思和便拿出了这个系列的第一本——《从广场到岗位》。我读下来的初始感受是亲切的，某些历史场景的记忆被忽然唤醒。1987年，我随于黑丁先生率领的河南作家代表团访沪，在《上海文学》周介人老师组织的座谈会上，第一次与陈思和相识，数日后竟在公交车上巧遇，他从手提包里取出一本书送我，正是后来闻名遐迩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关于“人文精神大讨论”，《从广场到岗位》书中有专节回叙，并提到王晓明策划了1993年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六届年会的“会中会”，我参加了此会，记得当时气氛凝重，与会者都是悄悄地个别通知的。之后发表在《上海文学》“批评家俱乐部”栏目的《现代人文精神的生成》（作者王鸿生、耿占春、何向阳、曾凡、曲春景），正是河南同人对上海所发起的这场大讨论的积极而审慎的响应。那时，我们都是“外省人”，对来自京沪的动静自然是格外留心的。



20世纪90年代初,在彷徨无地中紧张寻思是知识界的普遍状况。据陈思和在本书中对记忆的订正,他关注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和价值取向问题并由此形成“岗位意识”,是在1993年,与“人文精神”讨论同步发生,或许还要更早一点。那时他就提出“返回自身”,要弄清楚知识分子“赖以安身立命的传统”,其实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思考,至今我仍深有同感。但由于自己当时更多地纠缠于“精神危机”与“表征危机”之关系问题,所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对他的“庙堂、广场、岗位”三种价值取向说,虽然知道但并未受到特别触动,也就没有过多在意。直到这次读了《从广场到岗位》,才对他多年来的心思、想法和着力点有了相对完整和深入的了解。

不从理论出发,也不从流行的本本出发,而是从具体的史料出发,根据人物行动的环境、轨迹及其选择,把中国传统士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背景呈现出来,并着重对转型期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和价值取向,作出较为客观的提炼、区分和命名,其实是一件极易陷入困扰和冒险的事情。但在陈思和手里,一切却显得游刃有余、举重若轻,若不是盘熟了从晚清到民国的文化人心迹及其人生变迁脉络,肯定是很难把握到这一地步的。可以说,此前写作《中国新文学整体观》所形成的积累、历史视野和方法论意识,已给此项研究做了铺垫,并起到了相应的“立义—取向”作用。

由是,一幅动荡着、涌流着的浩瀚星图打开了。书中枚举大量近现代人文史上的人物实例,来佐证其观察结果和这种分类方法的有效性。大致说来,有属于或倾向于“庙堂”者如曾国藩、蔡元培、周扬;先“庙堂”后“岗位”(译书自课)复又拥袁入庙失败的是严复;一直抱有政治家“广场”意识的以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为代表,其中“最纯粹最具典范性”的是陈独秀;而持文学家“广场”意识的代表是鲁迅、巴金、胡风,其中最坚定同时又以“明确岗位意识作后盾”的“有学问的革命家”首推鲁迅;从“广场”走向“岗位”的有章太炎、匡互生、刘半农、贾植芳;把“庙堂、广场、岗位”混杂在一起的是胡适;有身在“岗位”却力图践行“广场”价值取向的如后期梁启超;有恪守“岗位”者如张元济、陈寅恪、陈梦家、沈从文;有呼吁“闭户读书”“自修胜业”的周作人,“对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表述得最完整、最自觉”;而树立了“南面王不易”之“岗位意识最高境界”者乃是王国维;还有自比“门神”的冯雪峰,居“广场”与“庙堂”之间;等等。

据本书交代,庙堂、广场、岗位,只是一种文学性说法,用来喻指知识活动的整体实践空间和博弈场域,同时它们也意味着不同的人生定位、价值取向。所谓“庙堂”,即“在政治权力系统里谋取价值”;而“广场”,则是“以启蒙为中心的知识分子”在“庙堂”以外引领社会变革所开辟的价值空间,新文化运动以来屡屡成为进步知识分子的主流导向。相较于“庙堂”“广场”,现代知识分子的“岗位型价值取向最晚形成”,所谓“岗位”乃是一种泛指,包含各种“可以寄托知识分子理想的专业工作”。作者认为,这种专业工作者,与手工业或技术工人类似,也靠劳动技能谋生,只是因脑力劳动“先验地包含了人文特质”,故能引导人“去关心超越个人性的社会公共事务”,在知识实践中“维护公正理性、道德信念、人性的全面展示等”。

岗位型价值取向,是本书的落脚点,也是作者一贯持守的“在当下社会活动中身体力行的准则”。但为什么如此突出岗位的意义?为什么此书最终偏离甚至放弃了关于“庙堂”意识的讨论?为什么许多像丁玲这样的革命作家在这里略一带过甚至完全缺席?诸如此类问题,是我在阅读中难免产生的疑惑,有时甚至会觉得,虽力求客观地还原,但史家自述大概也是有其偏爱和隐衷的。不过,陈思和的一系列考量毕竟经历了长期酝酿且日趋周全,通过文本字里行间的细究,便可以发现,其实对相关疑问,本书已经预留了回应和可供进一步思考的线索。

比如对丁玲一类革命作家基本未加着墨,是因为“本书所讨论的广场型价值取向并不适用于

已经实际参加革命的人群”。具体而言，“广场很容易被暴力摧毁：陈独秀沉沦，李大钊、瞿秋白等人的牺牲，成千上万的优秀知识分子用生命殉了自己的理想。中国革命最终转向武装斗争……已超出了知识分子广场意识的实践范围”。在作者看来，这也意味着广场型价值取向在实践中的失败。但书中又提示，“广场”包括一部分流浪型知识人群，“确实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人才”。

再如，早先标定“庙堂、广场、岗位”三角描述框架，这次重写为什么直接变成了“从广场到岗位”？作者是这样认为的：庙堂型价值取向属于传统士人，现代国家及其管理系统理应转换为“社会职能部门的岗位”。所谓“革命分工不同”，“共产主义者对旧庙堂意识的彻底否认与批判”，其理想正是要“彻底把庙堂改造为工作岗位”。在结语部分，陈思和有感而发地说：“假如今天的大多数知识青年依然迷茫于‘读书做官’‘学而优则仕’的意识蛊惑，那就说明今天的中国依然没有肃清传统封建文化的影响，还有必要在政治体制领域深化改革。”

陈思和之所以对岗位的意义如此强调，闪入我脑海的第一个反应是：务实。务实作为生活世界的基础支撑方式，不仅意味着对周遭环境的领会，也是这之后所产生的建设性的生存态度。本书第五单元一开始，作者就回顾了自己在1993年确立岗位意识时的心理过程。当时，他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广场意识、五四精神是否已过时？答案是否定的。那么，现在如何来继承和发掘五四遗产？他有选择地重读鲁迅和周作人，期冀“从周氏兄弟的文字里体味绝望中的个体的生命意义与力量”。作者自陈，“我的脑子里反复盘旋着鲁迅的声音：‘总而言之，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也许，只有务实地做些事情，才能摆脱类似的空洞感。做事就是行动，行动使自我得到充实，同时也必然带动世界，联系和充实着他人。在岗位上务实地工作，陈思和的确是感到快乐的。当然，把岗位看得这么重，还有更为宏观的历史理由：“庙堂性的价值取向适应于一元化的社会建制，广场型的价值取向适应于二元对立的社会形态，而岗位型价值取向强调的是社会的多元共存及其发展。”这应该是陈思和的理论发明，也是他最终把现代知识分子的道路锚定于“岗位”的一条社会学依据。

现实性，当然是务实态度的固有属性。但作者明确断言，“具有超越性的岗位才是属于知识分子的岗位”。接着闪入我脑海的第二个反应便是：超越。在岗位上如何实现对岗位的“超越”？本书大体表达了以下几层意思：其一，以学术为志业，并有所创造和建树；其二，坚持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其三，履行对一切负面现象的抵制；其四，做不妥协的批判者，运用知识专长及其公信力，非抽象、非乡愿地开展斗争，并将斗争范围建立在专业岗位之上。从这里，可以感到“岗位意识”与“广场意识”存在着相似性，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同：相似点是“五四”以来的启蒙立场、启蒙精神没有变，不同的是启蒙活动的空间场域发生了位移，实践方式则由登高一呼、群情激昂的普遍性追求，转向了具体而微的日常性努力。“超越”通常被理解为向上、向前的运动，往往与高远、提升、跃进、领先、突破限制等联系在一起。这当然是不错的。但除了这些，本书所谓的在岗位上超越，似乎更接近于某种“向下的超越”，即向细处、向民间生活、向存在的“物质层”超越。这种超越的价值依赖，正是时下常被人们贬称为谋生手段的劳动。关于资本主义造成的“劳动异化”现象，马克思曾有过精辟批判，而在社会主义辞典里，劳动则是光荣的，是劳动者的尊严所在。将“劳动”一词与“岗位”“超越”关联起来，既涉思想理路，也体现了陈思和的质朴心性，这里隐藏着一种对启蒙主义者极易滋生的精英心态的制约力量，有助于抑制知识分子的傲慢。这是作者的清醒之处，也是本书令人感动的地方之一。

诚如作者所言，“三十年后重新捡拾起这个题目，虽然谈的依然是晚清到民国时期的陈年旧事，



但我的思考里也融入了自己近三十年来社会实践的切实体会”。因此，这本书主要把注意力放在与自我的对话上，引证了李泽厚、王晓明、林毓生、李长之等人先后给予作者的启发，而有意识地回避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各种思想学术的激烈纷争。但在阅读中，我仍能时时感受到作者平缓叙述中的热烈心跳，能感受到他与其时代所存在着的紧张的潜对话关系。事实上，不仅庙堂、广场、岗位意味着不同价值取向，即便在同一空间和场域中，即便都处在人文社科工作的岗位上，也存在着具体而尖锐的认知分歧和价值冲突。这里，也许掩埋着一些仍有待开掘的当代思想的深井。随着这一系列写下去，读者也许会希望作者能更多地增加对话的维度，以使其学术生涯的内在张力及丰富性得以进一步展开。

当下世界正在发生剧变，大量新现象、新问题、新痛点已经或将要迎面扑来。笃信太阳底下无新事，一切可以从历史中寻找答案，继续依靠“历史叙事”来应对变局，这是一种选择；感到既往的历史经验开始失效，这场剧变可能将人类文化传统连根拔起，所以要拓展新的“乌托邦想象”，这是另一种选择。即便在这本书的题域内，也可以生发出一系列值得继续深思的追问，比如：如何区别“知识就是力量”与“知识就是权力”？我们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传统是否可理解为另一种“庙堂”？网络、短视频是今天的“广场”吗？“岗位”是固有的还是在流动、变化中生成的？西方的启蒙理性与 AI、智能机器人存在什么样的逻辑勾连与悖反？在技术的“去人化”趋势面前，如何持守人之为人的理由和可能性？大数据时代，人文理想的实践内涵又怎样释放？诸如此类问题，或许会出现在这本书的延长线上，也或许会挑战甚至突破类似的思考方式和研究框架。

所幸，积四十余年在“搞教育、办出版”的岗位上坚持不懈的努力，陈思和先生已经带出了一支队伍。这支队伍上承贾植芳先生，下启“60 后”“70 后”“80 后”数代学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形成一个不容忽视的复旦学统，并展现出文学思考的时代性和学术中国的丰富性，这当然是值得告慰和庆贺的。所谓“继绝存亡，薪尽火传”，陈思和“心中认同的是鲁迅—胡风—贾植芳传统”，“一种有血有肉的生命系列的传承”，我深知，他对传承的力量是一直抱有确定的信念的。

如今年轻人的实际境遇和所面对的人文难题，将变得更加艰困和棘手。面对错综复杂的时代之问，他们能否在一代代前辈铺下的基石之上，务实但不被规训，超越而不离大地，用智慧战胜智能，以德性参赞人性，从而走出一条更具未来性的中国文化更新之路，既令人担忧又令人充满期待。

从专业理性到社会理性

□ 陈昶，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每当我们提到“理想主义”，通常会十分自然地与 20 世纪 80 年代关联到一起，似乎它天然就是那个时代的属性，成为一个时代重要的精神与文化征象。如果我们在今天重提这个话题，但不再仅将其作为一个时代的精神特质与精神构造，且还注重与当下的社会经验、日常生活以及背后所呈现的思想文化形态形成有效的契合与关联，并由此激发出新的时代活力，那当代的理想主义问题便是值得重新思考的，而逐渐远去的 80 年代以及这四十年历史进程，也给我

们提供了能够用来反思与借鉴的诸多思想文化与精神资源。我们可以将陈思和先生的新著《从广场到岗位》作为一个契机与视点，在其回忆与论述中辨认他与同代人在时代中的困惑、思考与求索以及由此所走过道路，并以此作为历史与精神资源，给当下提供进一步思考和实践的方向与可能性。

读者大概都会注意到，陈思和将写作的起点设置在1993年“人文精神讨论”这个时刻，并以此为轴心，向前追溯至严复、蔡元培、黄远庸等社会结构转型时期的近现代知识分子群体，之后一路向下，从“五四”知识分子经由胡风—巴金—贾植芳这条脉络再次回到自己与同代人这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社会与时代语境中，他以个人史带出时代史与知识分子精神史的方式，回顾与反思了这段历史现场，最后将“知识分子”与“岗位”的讨论延伸到当下。这样的思考与写作设置，在我看来包含了三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第一，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历史追索？第二，为什么要将思考的起点锚定在1993年“人文精神讨论”这个时刻，进而，在80年代与90年代这两个不同时代背后的知识思想转换以及知识分子的根本性变化是什么？第三，将这场讨论延续到当下，背后的思考与逻辑是什么？

要讨论第一个问题，首先需要从第二个问题说起。相比同代的很多学者，陈思和的学术研究与学术实践似乎更趋于“保守”与稳定：他的工作始终在文学研究的领域之中展开，即使向外拓展，也仍是在与文学相关联的出版、编辑等实践中坚守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民间”是陈思和的学术研究中最为重要的学术框架与学术概念，它最初产生于其文学批评实践中。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陈思和就有着做同代人的批评家的自觉意识，他的很多触发与思考直接源于80年代文学创作的刺激并在与其互动中不断发展，关于“民间”的考察与建构，贯穿了陈思和对80年代至90年代文学的发展与转型的整个过程的追踪与思考。当然，“民间”在陈思和的研究中还有一层含义，即对知识分子岗位的精神属性的标示，早在80年代后半，陈思和就十分敏锐地意识到了知识分子在时代中的问题，并以对“五四”进行反思的方式，提出了知识分子的学术责任与社会责任的双重标准。很显然，学术标准和社会标准分别对应的是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与广场意识。不过，在陈思和这里，广场与岗位并不是平行式的非此即彼的选择，他强调的是广场意识应建立在知识分子的民间岗位的基础上，须通过民间岗位的实践方式才能发挥其作用与价值，二者是相互连接、相互转化的关系。当然，这样一种理解与强调，在80年代中后期浪漫的理想主义情绪普遍高涨的时候，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关注。

回顾陈思和的学术道路，可以清晰看到他对“民间”这两个层面的思考，都是在文学和社会的发展之中逐步形成与建立起来的，但如果进行更为细致的对照就会发现，审美属性的“民间”要比具有知识分子精神属性的“民间”出现得更早一些。这也不难理解，在一个时代的整体构造中，文学艺术往往是最敏感的，本能地将某些正在悄然发生的变化以直觉的方式显现出来，因而它往往处于一个社会即将发生与展开的变化的最前端，文学批评自然也可以感知和捕捉到其存在。而作为知识分子精神属性的“民间”则是需要通过理性的方式审视自身来照见的，自然也就稍晚一些。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社会更为显在、快速的结构变化的到来，在80年代随着文学创作孕育、发展起来的具有审美属性的“民间”和在与时代不断对话中形成的具有知识分子精神属性的“民间”，作为两条并行不悖的线索，最终合流、统一于“民间理想主义”，与时代形成强烈的对话性，这不仅成为后来陈思和的当代文学史著述的顶层设计，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陈思和与同代知识分子从人文学科的知识观念上设想社会的共同理想图景。



沿着这个共同图景，如果我们继续将前面所讨论的“民间”作为一个窗口或者说问题意识，就会看到在 20 世纪 80 年代整体的时代与社会氛围中，文学乃至整个人文学科具有知识生产的“集体性”与“公共对话性”，很多时代中重要的议题并不是在学科与专业内部，而是在广泛的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甚至是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之间的讨论与对话中出现并成为问题，然后被聚焦与讨论的。这样的知识与思想状态，是在具有整体性和共享性的时代、社会与文化语境中孕育和生长出来的，也因为跨越了不同学科的知识边界和超离在具体的日常生活经验之上，而弥漫与洋溢着强烈、主观的理想主义精神，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氛围与文化症候。这种知识状态与知识分子的身心状态，也延续到不久之后的人文精神讨论之中，深刻地影响了这场讨论的品格与限度，以及讨论之后知识分子的选择与探索之路。

如果我们将时间定格于 1993 年的“人文精神讨论”，对这场讨论以及基于这场讨论的“再讨论”做一个认真的辨认，就不难发现，在这场讨论过去后的三十年间，无论是当事人还是后来者，几乎都将对这场讨论的整理与分析，与对历史资源、在场经验和知识分子的自我审视与反思相连接，再或者就是在历史维度上对之做长时段的学术史深描。但可以追问：这些回溯和整理性工作，究竟还有没有给今天这个时代提供具有能动性和介入性的启示和力量？如果有，那应该是什么？今天仍然关切这场讨论的学人又应该怎样回答呢？

沿着上述思路，我们还是得再次回到 1993 年的“在场”之中，从知识分子层层递进的身心感受与自我痛切的剖析中，一步步朝向未来做更深层的追索与历史整理。这场讨论是以《旷野上的废墟》为契机开始的，讨论发起人王晓明的意图十分明显，他将关注的重心与焦点放在对社会和时代中出现的种种现象的反思与批判上，因为共通的时代感知与困惑，这很快就在知识界引起广泛共鸣。但随着这场讨论的持续展开，讨论的对象很快发生了位移，即从对社会问题的批判回缩到对于知识分子自身问题的审视上。这个微妙但重要的变化，在后来结集出版的《人文精神寻思录》中尤为明显。也正如王晓明所说：“今天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完全丧失对于生活的敏感，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精神困境，也强烈地渴望要走出困境。”^①对此，陈思和也同样提及：“我和王晓明一样，关心的是自己的问题，即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我们的安身立命之处在哪里？如何在自己的岗位上接通知识分子的人文传统？”^②很多年后陈思和再回顾当年，尽管语气表现得更为客观和抽离，但关切的主体和忧虑却未曾改变：“在这一场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究竟为什么知识阶层的表现如此张皇失措，如此令人不堪。”^③如果说陈思和用“张皇失措”描述了这次讨论中知识分子姿态的某一面，那么“一时无力挣脱的孱弱状态”^④则是王晓明对此姿态的进一步刻画，从 20 世纪 80 年代的精神高扬到 90 年代的精神自救，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王晓明接着说：“90 年代，‘市场经济’成为最大的潮流，几乎裹挟了一切。知识界却显得非常被动，手足无措，几乎完全丧失了对社会变化的理解力、丧失了判断力和洞察力。”^⑤按王晓明的话说，彼时的中国知识界并没有充分建立起对社会的整体理解和把握能力。但是，这个问题只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市场经济语境中产生，从而导致知识分子的“张皇失措”与“孱弱”的整体状况吗？我想并非完全如此，这样的知识状况的发生，固然有新的社会结构变化所带来的知识分子的不适与即时回应的不足，但更深层的原因，还需要回到 80 年代人文学科自身状态中去寻找。正如前文所提到的，80 年代的人文学科与知识分子开展工作的方式自有其时代逻辑，但回过头来看，正如一些学者反思广场形态的“学风空疏”那般，知识分子们在广泛讨论“启蒙”“现代性”“主体性”等问题的同时，也忽视了对正在发生的现实经验的把握与介入，因而乐观的理想主义情绪充斥其间。当这

①④ 王晓明编：

《人文精神寻思录》，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 年，第 274 页，第 275 页。

② 张汝伦、王晓明、朱学勤、陈思和：《人文精神：是否可能与如何可能》，《人文精神寻思录》，第 26 页。

③ 陈思和：《从广场到岗位》，第 27 页。

⑤ 王晓明：《半张脸的神话》，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 年，第 47 页。

样的状态延伸到人文精神讨论的时刻，就不难理解为何这样一场讨论与社会批判迅速演化为知识分子的心灵自审与诘难。进一步说，将这场讨论放到前后相继的历史构造中，就能看出它并不是表面上的知识分子广场式的“众声喧哗”，而是80年代后半段就已经开始出现的诸多问题延续到90年代的一次集中爆发，也可以看作知识分子最后一次集体式的“自救”或“自恋”。也就是说，如果以人文精神讨论为轴心，它成为知识分子对自我身份进行认知与精神审视之后，意识到自身对外部世界的回应、把握和介入能力的不足之后，所做出的结构性调整的开端。在此之后，知识分子才开始真正告别80年代、进入漫长的“90年代”。

要将眼光朝向未来，接下来便如王晓明所说的，面临“怎样去重建思想的能力”的问题。既然不可能回到80年代的原路上，那么，新的路要往哪里走？彼时的讨论中并非没有蕴藏着知识分子对自己与时代前景的思考，但这样一种朝向未来的面向，其时更多是被掩盖在知识分子对自身在时代构造中的身心感受的现场经验之下，还未及做更为理性的思考与调整。

在人文精神讨论过去了三四年后，对这样一种经验的整理与思考开始发生变化：岗位意识在知识分子的精神结构里逐渐被凸显，并被嵌入整个社会的发展结构之中。在1996年、1997年这两年的思考与写作中，陈思和将“个人的问题”置换为“当代立场”，不断强调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与当代社会转型之间的关联性。由此，我们可以回到第一个问题了，为什么在讨论当代知识分子的时候要向前追索？在人文精神讨论的两年时间中，像陈思和这样的知识分子很快就明确了对自我个体的重新确认，但是将这样的精神个体安放在一个怎样的历史传统中？这确实是更为困难也是在这个时刻极为关键的工作，因为这直接决定了知识分子从自我出发怎样理解和通过自身的实践作用于时代和社会，所以，陈思和向前代知识分子追溯，从严复到周作人，这个过程也是其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与“五四”启蒙精神在内心更加明确与笃定的过程，即陈思和将自己也纳入这样一条知识分子精神脉络之中，通过对专业岗位的坚守产生公共关怀，进而对时代和社会发挥作用。至此，我们不妨让视点更聚焦一些：随着90年代以来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变化，知识分子群体的工作也嵌入新的社会结构中，民间社会因此也成了陈思和将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与实践结合起来的一个场所。尽管这里还包含着经济的、资本的逻辑，但也正因这新状况的挑战，知识分子或者说陈思和所理解的知识分子与更为复杂的、开阔的社会生活的联动开启了。到了2012年，当陈思和谈起人文精神再出发的时候，沿着此前的岗位实践，他进一步将文史哲以外的社会学、法学、新闻媒体等都纳入人文的范围，在知识分子岗位的专业性与社会发展之间建立具有价值导向的内在关联。而十数年后，在《从广场到岗位》这本新书中，陈思和再次拓新了对知识分子的理解与要求，不再讨论外在的人文学科的边界，而是通过强调知识分子的专业岗位，进而强调专业性背后的理性意识与社会责任，要求知识分子以专业理性的方式超越个人性、关怀公共事务，与之相伴，一个社会的人文精神也必然会在其中孕育与生长。

在这样一种理性精神背后，知识分子的责任与精神向度将不再是20世纪80年代那种具有二元特质的“启蒙”，每一个在岗位上坚守专业精神与专业伦理，具有独立性、专业性、公共性的个体，都是社会最为坚实的基础，同时也是具有可生长性的力量。不过我们对专业理性也不能过分乐观，还应看到，专业理性并不直接等于社会理性，社会理性是在专业理性的基础上，在更广阔的公共生活中孕育、生长与形成的。它的基础是专业理性，有了这个基础，在一种健康丰富、超越知识回归常识、可以通达他人情感与经验的公共日常生活中，社会理性才会逐渐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说，



知识分子是在“漫长的九十年代”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中逐渐发生变化的，这种变化起源于知识分子向内的自我审视，却在不断专业化的发展过程中向外拓展，这种沉降到日常生活、根植于日常生活的社会理性，或许才是我们这个时代和日常生活中最为重要的。这也正是陈思和所思所述知识分子岗位里的专业性、超越性、民间性的题中之义与期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从专业理性到社会理性的建设和努力的过程中，一种新的有滋养和护持社会能力的，又有朝向未来能量的理想主义，或许可以逐渐被建立起来。

“岗位”的旧义与新变

□ 吴天舟，复旦大学中文系青年副研究员

① 本文对于陈思和观点的引用俱出自陈思和：《从广场到岗位》，北京：天津出版社，2024年，下文不再另注。关于“人文精神寻思”的综合回顾，特别是对这期间陈思和诸论的检视与批评，本文多受坂井洋史启发，参见坂井洋史：《忏悔与越界：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8—39页。

② 本文对于王晓明观点的引用俱出自王晓明：《刺丛里的求索》“序”，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第1—20页，不再另注。

作为“理论形态的回忆录”，《从广场到岗位》^①的用意不在于“提出新的关键词做新的探索”，而是希望“尽可能忠实地站在今天的立场来反省当年思考问题的过程”，以“自我的质疑与批评”“还历史一个说明，给当代一点启发”。

以今日之世思昨日之世，以今日之我观昨日之我，陈思和将眼光投向参与“人文精神寻思”和写作《试论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的1993年。这是其“世界观发生自觉转变”的关键时刻。当时的陈思和“思想处于低迷惶惑时期”，彷徨在“我往何处去”“以后的路怎么走”“我将在哪里找到安身立命之处”等一系列存在论意义上的诘问。通过“追根寻源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形成的源头”，归纳出庙堂、广场和岗位这三种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并从中自我择选，他寻找到了能够说服自身的答案，也由此奠定“以后坚持了三十年的人生道路”。得其“自”而为将来准备好一个自我，恐怕乃是“人文精神寻思”之于陈思和格外重要的意义。

回望“人文精神寻思”这场影响深广的文化事件，可以发现，陈思和的问题意识与求解思路既带有时代共名的烙印，又包含着某些自成一脉的内容。20世纪90年代初，陈思和埋头学习德语、重新阅读二周兄弟文章，心境亦有几分贴近当年抄古碑的鲁迅。与此同时，他的友人王晓明也怀着类似的荒诞感匆匆行走在满目秃枝的校园。^②面对此前的历史风沙和眼前的“下海热”，王晓明曾经的理想化作对一系列既往“幻觉”极其严苛的自我清理，其结果首先便是被陈思和视作“人文精神寻思”出发点予以专论的《追问录》：“赖有它，才将知识分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亢奋与沮丧和九十年代的沉思、追问、讨论等一系列精神活动无形地联系在一起了。”过去论及“人文精神寻思”，多将起点置于王晓明主持的座谈“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在《上海文学》1993年6月号上的发表。这篇集体讨论切中时弊，也因此洛阳纸贵。但需要指出的是，现实批判不过是“人文精神寻思”的片隅，至少其本初的力学向量既非朝向外部，也不瞄准作为群体的知识分子或抽象的知识分子概念，相反，它乃是一种极其个体性的生存意义探求（这同1985年前后风起云涌的现代主义思潮不无关联）。可以说，离开了酷烈的自噬其身以及之后的身份重建，知识分子们恐怕根本无力撑起他们批判的姿势。当然，众声喧哗的讨论未必只有一个源头，实际情况或更接近陈思和的概括：“每个参与讨论者都有自己的思考范围和研究课题，突然遇到了一个时机，像各条河流汇总在一起，就如伊格尔顿所说，构成了一个具有变异性的‘文

学事件’。”但无论如何，仅仅看到知识精英同市场经济展开后急速变质的社会环境的龃龉及其抵抗，而忽略了“人文精神寻思”自我反省和自我拯救的初心，恐怕会遮蔽这场学理未必深入的探索的重要的历史背景和珍贵的思想内容。

进一步追溯，“人文精神寻思”亦是寻根思潮刺激的产物。陈思和说：“1986年到1989年之间是五四的现实战斗精神被重新高扬的时段，同时也由于寻根思潮的出现，以民族传统文化的重新被‘寻’为契机，作家们对五四的主流精神也提出了不同的理解（阿城、李锐、韩少功等）。这多元并存的时代思潮，对我的学术思想及其道路的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受惠于寻根思潮方面，王晓明与陈思和别无二致，其《追问录》等一系列该时期的重要著作，其实更似形态另类的“寻根文学”。但就寻根的取径与结果而言，这对搭档却呈现出了不小的差异，而这也预示着克服精神危机后两种不同的实践方式。^①王晓明所挖掘的精神病根是自身作为启蒙者对于希望和外在力量的依附和盲目，因此，就像其描绘的鲁迅重在“绝望的抗战”精神一样，^②王晓明选择了一条一个人“在刺丛里姑且走走”的道路。可以说，借由“人文精神寻思”，王晓明更加坚定地继承了五四的现实战斗精神，这一点直到其2022年在网络这一虚拟“广场”留下的系列随感中，依然清晰可辨。而寻根思潮却动摇了陈思和既往对于五四主流传统的绝对信赖，他开始注意知识分子以启蒙和批判面目出现的广场意识中内嵌的缺陷，特别是其作为反题而与庙堂形成的同构关系。此种同构一方面带给知识分子随时向庙堂复归的诱惑，另一方面也迫使他们在启蒙的领导权被庙堂取代后陷入一无所有的境地。于是，探索庙堂与广场以外的第三种价值取向，成为陈思和当时及此后主要的用力方向。相较于某个确定的有形岗位，让知识分子彻底摆脱庙堂这根基轴的向心力，尝试在权力体制相对薄弱的地带建构属于自身的文化价值规范，这一方向转换或许才是其提出“岗位”概念更加根本的意涵。如此，即便现实条件下既有的工作变得难以维系，知识分子也仍可能因地制宜，继续以创造新的岗位、坚守使命作为自身行动的准则。

具体到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语境，面对此前知识分子广场意识受挫后留下的废墟，陈思和在实践层面也做出了颇为大胆的选择。他试图以危为机，到方兴未艾的商业文化这一众多同代人敌视的蓝海里试试机会。从严复到鲁迅，陈思和看到了先行者在庙堂边缘通过积极拥抱现代消费文化和传播媒介而成功闯出新路的先例。他刻画的鲁迅游走在上海这座现代化都市提供的出版社、书店、杂志等文化空间中，身边团结了一大批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背后更有无数匿名的读者作为后盾，其形象迥异于王晓明笔下那个晚年极度孤独的精神界战士。但对彼时“满脑子都是现代知识分子自己办出版的故事”的陈思和来说，更加典范的历史原型还属巴金、吴朗西等人创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通过这批亲炙自己的长者，安那其的理想与90年代人文知识界对于公共领域成长的普遍信心交叠在一起，构筑出陈思和对于未来可能的多元共存社会的真纯憧憬。

站在事后诸葛亮的位置回眸，陈思和当初的判断可谓得失参半。从积极的角度看，利用20世纪90年代相对宽松的舆论空间和尚未彻底走向利益导向的文化市场，陈思和在自己开拓的岗位上留下了“火凤凰丛书”等一系列有口皆碑的实绩。但风生水起的背后，正如书中所反思的，彼时几乎是摸着石头过河的陈思和对于“市场经济可能带来的负面性警惕不多”，且对社会转型的程度预期得过分乐观。毕竟，晚清至五四的历史同90年代后的社会现实及发展趋势相比，两个时段的历史条件与制度基础到底不同。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和即便拥有职业但仍游走于社会自由浮动的人文知识分子，这两极力量的不均衡实则伴随着现代化进程被越拉越大。至于见风使舵的资本，显然也不会是知识精英永恒的伙伴。对于三十年前的陈思和而言，著书立说、编辑出版、

①《从广场到岗位》用不少篇幅记录了陈思和与王晓明围绕知识分子话题从先秦到五四多个层面上的对话。王晓明敏感的思考不但令陈思和获益匪浅，同时也是后者理论上长期潜在的辩论对象。挖掘“岗位”这一知识分子的第三种价值取向，部分程度上包含着陈思和希望为因难舍“广场”而陷入精神危机的挚友消解绝望的意图。这种共同体内部既相互启发同时也以坦诚切磋彼此鼓舞的情谊，乃是“人文精神寻思”在自我反思之外留下的又一笔珍贵财富。参见陈思和：《三十年治学回顾》，《脚步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页。

②参见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



教书育人这三位一体的岗位，不仅意味着在庙堂和广场以外安身立命的理想，同时也不乏可资利用的现实机制予以支撑。但随着资本与权力在各个领域相互渗透、互壮声势，甚至当包括批判在内的知识分子活动也被裹挟进二者共谋的内循环时，陈思和等人一度因利乘便的历史窗口已然大幅缩小。这并非在低估一代知识分子开疆辟土的意义和困难，相反，正是通过他们长期锲而不舍的努力，上述下滑趋势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延缓。可恐怕还得坦然直视，社会形态的变化让流动弹性和个人所能自主支配的空间今非昔比，不仅坚守教育和出版等陈思和心目中人文知识分子的基本岗位变得愈发不易，同时，要想贯彻“岗位”概念的本义，利用社会的孔隙垦拓足以深耕的新空间，较之当年，难度亦有增无减。

站在相对长程的视角把握，伴随西潮激荡开启的大变局，建立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成为晚清以降中国贯穿始终的“根本性议程”，^①包括“人文精神寻思”的参与者在内，历代对于现代性孜孜以求的知识分子，其实都置身局内，以各种方式参与、回应着议程的演进。知识分子或松或弛的活动空间，实则是议程在不同历史阶段随时势波动的结果。从严复、鲁迅到“人文精神寻思”，知识分子不断试图建立替代性方案的努力值得尊敬，但只要议程本身尚未中断，其努力大概终究只能纾解一时之急，停留在治标的层面上。由此，将议论收束在知识分子论的范围内，恐怕自有局限。毕竟，随着近代四民社会的解体，读书人（特别是其中的精英人物）早就不再是一个足以独立事功的社会群体，而必须外挂到其他社会集团（无论是会党、新式军人、工商业者、职业革命家、外国势力还是民族国家），凭借一定程度的合作甚至依附关系方可有所作为，^②20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的启蒙幻觉及其最终的溃败，不过是再度验证了这一点。对此，始终在岗位上感受着履行知识分子责任之艰的陈思和当然心知肚明。时隔三十年的旧题新作，尽管刚健如故，但那股曾经以退为进的乐观却已在相当程度上被忧思取代。强调岗位的当下性更多瞄准的，乃是逆境中以个人力所能及的方式对于底线的承托。这其实与王晓明的“刺丛里的求索”一样，焕发着“反抗绝望”的底色。

在此意义上可以发现，回应着当下生活所给予的实感经验，三十年后，陈思和微妙地调整了自身对于“岗位”的定义方式：它从原本主要集中在人文知识分子的范围，扩展到“医学、公共卫生、科学技术开发”等一大批功能各异的“非人文社会科学的社会岗位”；从一个表达价值取向的虚构修辞，落实为知识分子面对“跨国公司、司法和警察机器、财产投机商”等对手“更为直接和具体的斗争意识”。借用书中对于福柯观点的转引：“知识分子现已不再以‘普遍性代表’‘榜样’‘为普天下大众求正义与真理’的方式出现，而是习惯于在具体的部门——就在他们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把他们置于其中的那些地方（寓所、医院、精神病院、实验室、大学、家庭和性关系）进行工作。”通过在一个个专业岗位上“真实的、物质的、日常的斗争”，陈思和心目中的知识分子或许会如江河里的小小石块一样，用绵薄之力潜移默化地改变水流运行的轨迹。就此而言，陈思和所提供的启发并非任何现成答案，而是如他与王晓明等同仁留下的历史印迹一样，要求着知识分子在更加广泛的层面上给出创造性的思考和身体力行的实践。毕竟，倘若缺乏这样的准备工作，纵使变化的机遇在未来真的到来，知识分子也无力给出合适的回应，而这只会让历史陷入新一轮的循环往复。

① 参见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兼、陈之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

② 参见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9—153页。

一份答卷：如何重提知识分子岗位意识

□ 陈思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 梁钺皓，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引言

20世纪90年代似乎是关于一个名为“从头开始”的寓言的时代，尽管“新时期”这个宏大命名的起点早已经归属于它之前的时代，但或许正如汪晖所言，那不过是一个漫长的“革命世纪”以“自我改革”的形式展开的尾声。知识分子在80年代种种关于“新启蒙”的思索与呐喊，其命名本身就已经袒露了这是一个重新征用“五四”的时代。这种重新征用对于80年代的知识分子来说，重要之处就在于，他们毫不费力地从历史中捕获了种种关于“知识分子”的想象，这种想象不仅仅涉及“知识分子”的定义，同时也涉及知识分子的身份、话语模式甚至阶级地位。90年代正是在完全不同的情境中开始的。在陈思和关于“知识分子”问题再思考的新书《从广场到岗位》的开头，我们或许会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他将自己一系列关于现代知识分子问题讨论的起点，锚定在了“从头再来”的发生时刻。他在书中说：“这一切，都是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的世界观发生自觉转变开始的。”正因如此，陈思和的再思考不仅仅是对自我学术生涯的回顾与梳理，其必然也将是对90年代爆发的“知识分子”状况及其问题的一次再审视。正是在这样的回顾与再审视中，曾经被讥讽为“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90年代重新获得它的潜能，因为种种在当时未能及时阐明的问题与观念，都通过对另一种新文化传统的追寻与阐释得到了回应。“漫长的九十年代”即将终结，知识分子已经到了要交出答卷的时候。

梁钺皓：陈老师您好！很高兴和您做一个关于您的新书《从广场到岗位》以及知识分子问题的访谈。其实关于知识分子，您在很多的文章和对话里都做过思考和讨论，这些系统性讨论的起点大概是20世纪90年代初，您在书里说，那一系列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文章其实是在给自己的人生道路寻找精神支点。大概90年代就是这样一个奇妙的年代，与过去近一个世纪都不一样，中国知识分子终于失去了外在力量赋予的时代命题及其附带的身份意义。90年代的“无名性”给予知识分子的危机感与虚无感，似乎比其他所有群体都要剧烈，从乐观过剩的80年代被抛出，好像一切都到了令人沮丧的时刻。

陈思和：关于你提到的这些问题，是存在这样一些现象，但是没有你想象得严重。历史是一道滚滚向前的时间长河，不可能被一刀切断。我作为一个20世纪70、80、90三个年代的亲历者，回忆起以前的事，常常在脑子里混成一片。再往前追溯也是这样。记载历史的人为了方便纪事，喜欢用“新纪元”“新时期”等夸张性的标志，仿佛每个时代都是开天辟地、互相割裂、各立宗旨、新旧交替。如果孤立地看，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看得多了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和理解。就像周作人说的，历史是会重新来过的，群鬼也都会再生的。

先说80年代。你在开场白里说到，知识分子在80年代关于“新启蒙”的提法、命名本身就袒露了这是一个重新征用“五四”的时代。表面上看是这样，但我是过来人，当时的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的。恢复五四时期“启蒙”的提法，是有一个前提的，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大反“封建”意识形态。在这样的前提下，“新启蒙”“解放思想”的任务才被重新提出，成为主流的文化思潮。



周扬当时发表过一篇很重要的文章,说中国有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一次是“五四”,一次是延安整风,第三次就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样就把“五四”传统与当时政治领域的拨乱反正衔接起来了。知识分子在历次运动中被剥夺了独立思想的权力,他们只能依附于体制,选择他们所认为正确的决策路线,所以反封建、反现代迷信,思想解放、独立思考,都是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但这符合知识分子内心的愿望,于是他们就在这个思潮上做文章。巴金的《随想录》就是这样写出来的。当然,思想解放运动中,各个阶层的思想意识都在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知识分子在自我的发展中,慢慢地从“五四”的精神传统中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思想资源,开始有了独立的思考和追求。你学习文学史也可以体会到,新时期初的小说、诗歌、散文等,都是强调批判封建意识、批判民众愚昧、呼吁思想解放,都是与这个大背景有关的,后来随着西方现代派文艺的引进,寻根小说崛起,原来的思维模式就被打破了,出现了比较新的审美因素。这些新的因素很快脱离了体制藩篱,开始向体制外(或者是国外)的思潮理论寻求资源。

梁钺皓:您对80年代的补充确实让我意识到,我的理解大多来自一种后见者视域的讨论分析,这里其实存在亲历者与后见者之间的视差。

陈思和:你对90年代的理解,当然没错,但也未必如你想的那样严重。为什么呢?中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遭遇过多次挫败,理想破灭,身如浮萍,也就是你说的“无名性”给予知识分子危机感与虚无感,譬如20世纪20年代末大革命失败的那一次。为什么我把五四时代称为“共名”时期,把20世纪30年代称为“无名”时期?有很多人不同意我这样划分,但我是从知识分子与时代的关系而论的。在《从广场到岗位》里,我对30年代知识分子的道路选择特别看重。我在书中讲到,市场经济并不是90年代才降临中国的,30年代鲁迅、巴金他们也遭遇过这样的问题,他们是怎样对付过来的?有了这样的榜样,我当时策划“火凤凰”丛书等社会实践就有了依据——否则就与一般书商无异了。关于出版方面的实践,我本来计划要在书中专门回忆的,但写着写着偏离了原定计划,就没有写进去。你刚刚说,90年代使“知识分子终于失去了外在力量赋予的时代命题及其附带的身份意义”,我倒不这么认为。你这句话是与前面你理解的80年代知识分子征用“五四”资源而确立身份有关。我的理解则相反,80年代知识分子的“五四”话语系统的建立,是时代赋予的,而不是他们自己获得的,所以一旦遇到考验就变了;而在90年代的社会实践中,知识分子才获得了自己认知的时代使命和身份意义。外在力量其实并没有消失,消失的是规定性力量,90年代的知识分子必须通过自我实践去认知与获得时代命题和身份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在90年代,我才开始自觉地实践中国知识分子可行的道路和理想,也是“五四”时代精神在当代的尝试。

梁钺皓:如您所说,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知识分子需要通过自己探寻新的道路,而在探索的过程中也逐渐开始有了分歧。比如您书里提到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这是由上海学者发起、全国都参与的讨论,但当时其实有很多质疑的声音。这些支持和质疑的观点似乎有某种地域性,我们私下里戏言,从90年代开始学术界重新有了“京派”和“海派”之分。同样是90年代知识分子的再思考,陈平原老师就批评80年代“学风空疏”,提倡走出“五四”、回到书斋。但“人文精神大讨论”好像仍然保持一种书斋之外的姿态,重新呼唤“五四”。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在90年代开始有了日趋明显的分歧?

陈思和:这就是我这本书要写的意思。“从广场到岗位”只是一种提法,在当时,对于社会变化的趋势和知识分子的重新选择,很多人都是意识到的。可能平原兄认识到这一点比我还要早

一些。他说的走出“五四”、回到书斋之类的意思，也是一种比喻性的提法。“五四”与“广场”同义，“书斋”是知识分子“岗位”的另一种隐喻。就如周作人所说，野和尚登高座妄谈般若，还不如在僧房里译述几章法句更为有益。“僧房”也可以作“书斋”“岗位”解。我讲现代文学史总是有意突出周氏兄弟的意义，这对兄弟实在太厉害了，之后几十年的事情都被他们一一说中，而且入木三分。平原兄没有与我交流过他的选择，他住在北京，如你所说，“京”与“海”环境还是不一样。北京有一批学者转向研究国学，办同仁刊物，联系着海外汉学界的一种趋向，他们做得风生水起，这当然也是一种“岗位”的自我确定；上海有十里洋场做底子，一下子就流行了市场经济、股票投机、下海风潮……时势逼人，更容易激化人文知识分子与市场经济的矛盾。“人文精神大讨论”选择在“书斋”之外，某种意义上，仍然是“五四”广场精神的延续，我后来强调的“岗位”，包括书斋和学术，但更强调在书斋之外的社会实践。譬如教育、出版等领域，都需要在社会实践中努力。就我的实践而言，没有离开过对“五四”精神传统的弘扬。平原兄也没有离开过对“五四”精神的赓续，走出“五四”不是抛弃“五四”，就像我在书中分析了刘半农、周作人、钱玄同等人的道路，实际上他们都没有离开过知识分子的“岗位”。换句话说，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岗位”，包含了知识分子对一般专业岗位的“超越”，还是隐含了“广场”的意义。

梁铨皓：所以“岗位”这个说法的定义很重要。其实“从广场到岗位”这个标题会引起一种误解，让人以为这是知识分子价值观念的二元转向。和您上面所说的类似，您在近三十年前和王晓明老师的对谈中也提到过，鲁迅、胡风式的独立批判立场和知识分子的民间岗位，是需要同时被坚持的。

陈思和：书名为什么要用“从……到……”的语词结构，而不是用并置结构来体现？我在书中做过一点解释。首先是对“五四”到大革命失败这十年间知识分子价值取向变化的客观描述，我接下来要修订的现代文学史里也会强调这个问题。20世纪30年代鲁迅、巴金等坚持广场型的作家们在创作道路上走得非常辛苦、非常逼仄，但是突然横空里出现了一批坚持以民间审美为书写特征的作家，如沈从文的湘西民间世界，老舍的北平市民社会，萧红的北方民族的生死挣扎，艾芜的西南少数民族风景，李劫人的四川市民社会……再晚一些还有张爱玲笔下的沪港市民社会等，一下子打破了原来只强调启蒙批判单一基因的知识分子叙事，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民间世界。对于这样的文学发展趋势，我也要“从……到……”的语词结构来概括。这不是说五四启蒙、批判的文学道路转向了，在鲁迅的现实战斗道路上仍然有胡风、路翎等七月派，茅盾等左翼作家群，巴金、曹禺等自由主义创作，以及丁玲、萧军等延安“鲁迅派”在延续，但是，“到”就是一种多元并举的繁荣状态，大量来自民间社会的文学创作，像无名氏那样的浪漫主义创作，钱钟书、张天翼的讽刺小说等，由一元、二元的叙事到了多元的呈现。其次，你已经注意到，知识分子的“岗位”自身就含有超越专业性的特征，即隐含了公共性和批判性的特质，某种意义上，仍然承担着“广场”的使命。

梁铨皓：您很强调“广场”传统的内在延续，但其实您在《我往何处去》中也反思过“广场”的负面因素。您曾经提过一个“刀俎与鱼肉”的困境。您说，您这一代知识分子要克服这种困境，必须进行痛苦的自我批评与自我反省。这种知识分子针对自我以及自身所处位置的反思，是不是岗位意识的重要部分？

陈思和：从理论上来说，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必须包含知识分子的自我超越，即对自己专业的超越。以教师为例，教师是以三尺讲台为岗位，他的职责就是勤勉教学，培养学生，把科学知识传授给学生；以出版家为例，他编辑刊物也好，编辑书籍也好，都要负责地把好的读物传送



到社会上，使之成为人们的精神食粮。同理，作家书写文学作品，艺术家在舞台、银幕或荧幕上塑造艺术形象，或用色彩和音乐陶冶人们的情操。说得更远一点，新闻记者、律师、社会工作者也一样，尽职地履行知识分子广义的传道事业，就算是尽到了岗位的责任。知识分子的岗位不仅仅在物质层面上创造财富，而且作用于人们的精神世界的建设，使人之间更易交流、人们的精神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所以它的职业本身具有精神性、人文性的特点。这些特点对岗位的事功性而言就有超越性。至于从事这些职业的人能不能意识到这一点、能不能自觉做好这一点，又是另一回事，如果他只是把职业看作谋生手段、赚钱途径而有意抹杀职业内涵的精神性，那就没有达到知识分子岗位的高度和意义，虽然他也在从事这些行业，但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当一个好的新闻记者和主持人，与那些蹭流量带货做大嘴巴的人，当然是不一样的，这里就有一个价值取向的区分。这是第一层面的意义。还有第二层面，知识分子要超越专业。知识分子岗位在专业内部有自身的传统、规范和标准，但是知识分子岗位主要设立在民间社会，服务于社会人群，所以必然会涉及从专业立场出发，介入社会正义，对社会非正义现象提出警告、批判。这不是仅仅做好本职工作就可以达到的。只要你在本专业做得够好，就必然会涉及维护社会正义方面的实际考量，所以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越饱满，他在人格上就越能够接近知识分子的本义。我在本书中特意选了一个例子——易卜生的剧本《国民公敌》，剧中的医生斯多克芒就是一个典型。他是一个医生，不仅医术高明，而且通过科研发现了一种病毒，为了维护市民的健康，他挺身而出，与整个小城的官僚集团、资本集团、愚昧的市民庸众抗争，终于成为“国民之敌”。这是知识分子岗位意识升华的典型。

知识分子岗位意识所要求的自我反省，是一种内在的自我斗争。我觉得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这样一种自我升华过程中不断克服个人利益的“小我”的诱惑。对外，克服不受节制的权力、资本等因素形成的对岗位意识的冲击力量，不断扩大知识分子对社会大众的仁爱心，自觉捍卫岗位的神圣与纯洁；对内，从自我上升到无我的境界。这个过程同样是极其深刻甚而极其严酷的自我斗争。

梁铨皓：在“广场”之外，另一个概念“庙堂”对于“岗位意识”的理解也很重要。您将陈寅恪1928年正式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视作对岗位意识的真正张扬。这是一种与庙堂主动保持距离的姿态，即使岗位本身有可能就是庙堂提供的。在传统的语境里，可能“非庙堂”与“民间”就是一组近义词，但是在您的论述中是有区别的，它们的区别在哪里？

陈思和：“庙堂”的概念，当是指向古代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的价值取向，如果放到现在的语境里，是需要加以限定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城市管理部门、国家基层组织机构，都应当视为社会服务部门，毛泽东提出的“为人民服务”贯穿的就是这样一种思想。知识分子岗位的特殊作用就在于它的民间属性。知识分子岗位的民间性主要体现在大量知识分子的工作岗位都是直接面向社会，他们的工作是直接为民众服务的，尽管这些岗位是由国家设置的，但他们还是有相对的独立性，是以“岗位”为中介，直接地为社会民众服务，间接地为国家服务。“非庙堂性”就是指这样的特质，也可以称作“非官方性”。强调岗位的民间性，就是强调岗位在社会中的独立地位，这是现代意义上的“民间”，与传统社会“庙堂—民间”二元循环的封闭结构有着本质的不同。

梁铨皓：谈到“民间”，我就想到20世纪90年代同样提出过“民间”的韩东，他论述的“民间”正面对着“体制、西方话语优势和市场”的三足鼎立，也就是说“民间”是这三者之外的一个新主体。

这让我想起您在书里讨论“人文精神大讨论”时提到王蒙参与其中的出发点。“人文精神大讨论”除了面对市场与后现代理论，其实这里也隐含着部分知识分子和体制的互动关系，因为经济改革本身就是由体制推动的。

陈思和：透彻地看，市场不是从外面输入的，它是中国体制改革的一个选择。说到底，中国现代化历程里缺少了资本主义高度发达这个环节，中国属于后发国家，起步晚，但发展迅速。《易经》说的“潜龙在渊，勿用”，一旦腾跃而起，也势必拖泥带水，搅得天昏地黑。但这也没有什么坏处，因为龙总是要腾飞，中国也一定会发展的。资本没有那么可怕，关键是如何驯好这条“潜龙”，这就需要体制的力量。所以，体制与市场为一体之两面。不过，当时“人文精神”的讨论，主要还是针对知识分子自身的精神状态，对市场经济的批判是间接的。

韩东谈的“民间”，与“人文精神”“知识分子”“岗位意识”不是一回事。但韩东这篇文章谈得非常好，给了我很多启发。不过在我的理论实践中，“民间”不是乡土民间，它本身也是来自西方的话语。我在1993年写的《民间的浮沉》一文里，开宗明义：“当我们讨论它（民间）的定义时，只有在下列一点上，部分地吸取了西方 civil society 论者的观点：即民间是与国家相对的一个概念，民间文化形态是指在国家权力中心控制范围的边缘区域形成的文化空间。”我读王晓明的访谈文章，发现他也注意到这一点。当然这不是唯一的概念资源。在艺术评论方面，我更多吸收了巴赫金关于民间狂欢的理论成果。我是想强调，“民间”的概念不是与“西方话语”隔绝的，对于人类的思想成果，全人类都有权利去享用。所以，该怎样理解“西方话语优势”，可能也是见仁见智吧。

梁铨皓：您在前面的回答中提到要克服不受节制的资本、权力等因素对岗位意识的冲击。其实您在提出岗位意识之后，在大学教职之外尝试过各种工作，也直接面临过类似的考验，比如您也在市场时代主编过期刊、策划过图书。在中国的早期资本主义阶段，在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的时代，资本尚且可以作为一种新兴的前进力量。而在当下，平衡人文理想和资本逐利（甚至“生存”）似乎越来越成为一个难题。您也承认，在20世纪90年代您对于资本带来民主性的预估过于乐观了。今天知识分子身处这种岗位，还能在多大程度上坚守岗位意识呢？

陈思和：我刚才提到，原来我在这本书里计划要写到策划“火凤凰”系列丛书的经历，后来没有写进去，就是因为我对于当代资本介入文化事业所带来的负面性的认识越来越深化，并认识到其严重性。可以说，我当年从事的文化出版、编辑等工作，都是带有实验性的，是有理想指导的，但是最后也可以说都是失败的。当然这些活动也产生过一些好的影响，以至于几十年后的今天，仍然有人会提到这些丛书和刊物。这些问题我一直觉得很难下笔进行回忆，担心不能准确地表达我的认识。你不是在帮我编关于编辑出版的文选吗？也许在那本书里我会提到这些事情，当然也是初步的，浅尝辄止。

梁铨皓：您在进入21世纪开始担任复旦大学的中文系系主任，这是一个不可避免地与体制发生关联的岗位，也就不得不融入这个体制，以保证各种评估的顺利，使学科获得发展的资源。在这种时刻，我们应该如何维持知识分子岗位的相对独立性？

陈思和：你的问题都很实在，也很尖锐，在这里并非几句话就可以回答的。总的来说，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我是从一个接受知识者（学生）到传播知识者（教师），进而成为一个现代文学、文化传统的学习者和实践者，比较多的是从事体制外的社会实践和学术研究。进入21世纪，我确实在事功方面投入了较大的精力，这也是一种意外的选择，我原来没有这方面的人生规划。但



是一旦机会不请自来，那我也确实想去试试。在接受主编《上海文学》的任务时，我一方面想着回报周介人老师对我的培养，他那时已经去世，我不愿意看到他生前耗尽心血的刊物就这么垮下去；另一方面还是知识分子的理想在作祟，想试试通过努力能否办成一个具有理想色彩的刊物，这与我策划“火凤凰”等系列出版物的思路是一致的。接受中文系系主任的职务也是一样，我未主动要求承担这项工作，但因为一些原因，学校领导和中文系老师们希望我去接手，我也没有考虑好就匆匆上阵了，但我的工作思路肯定也是把它看作一个知识分子岗位。虽然，这在专业性和民间性两方面都会受到掣肘，不过我还是勉为其难，在这个岗位上做了十二年（准确地说，是十一年半），接着又在学校图书馆工作了八年。知识分子理想的力量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主观世界，尽管体制内许多规定有时候会与我的理想发生冲突，尽管我时时警惕自己不要被异化。现在我终于退休了，基本上卸下了肩上的责任，我想等以后空闲一些，我还会好好反省这段时期（差不多也是二十年）的工作，也会另外写出这段时期的所有尝试、实践和教训。

梁铨皓：在这些知识分子的现实岗位和其他宰制性力量的矛盾以外，我很想和您聊一聊另一种形式的岗位，即知识分子的“精神岗位”。您前面的回答里也提到，要“不断扩大知识分子对社会大众的仁爱力”。我想起，在您和柏琳的访谈里，您在讨论岗位意识的时候聊过一件小事，就是您乘出租车时遇见不小心违反交通规则司机，总是会把罚款补给他。我想起今年自己也做过类似的事情，那时候我还没读到您的这段访谈，所以我有一点困惑，“岗位意识”背后是不是有一种强大又朴素的道德力量在发挥作用？

陈思和：你做得非常对。其实这些事都不是非做不可的，没什么道德律令强迫你去做，而且也需要有一些前提，譬如，那个司机确实不熟悉上海的交通（那时还没有导航系统），违反交通规则是一时疏忽。你作为一个乘客，虽然是在一件很小的事情上安抚了他的情绪，却也让他感到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人文精神不就是在人与人之间传递暖意、鼓励人对生活的信心吗？不要把人文精神的力量看作高高在上的教师爷的工作。其实知识分子的力量就是体现在自己的岗位上。精神岗位也一样，都体现在日常生活中。

梁铨皓：最后一个问题，也许是我的误解，我总觉得您在讨论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时，底色略显灰暗。您在书中说，广场意识受挫就会带来岗位意识的高涨。快三十年前，您在和张新颖老师的对谈里曾说过，自己已经放弃了对下一个文化高潮的期待。也许正因如此，才要将广场意识内化到岗位之中。不知道您对下一个文化高潮是否会到来的预估，是不是还保持着和过去一样的看法？

陈思和：那要看下一个文化高潮究竟是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在现代中国的发展过程中，知识分子秉承五四新文化传统，努力工作，总是期待会有文化高潮出现。但是它必须有一些标志性的特征，如人的个性自觉得到自由张扬，活动环境有相当的宽松气氛，精神创造和探索得到社会舆论的鼓励等，才会有文化巨人辈出、文化硕果丰收的可能。

但是在你的问题里似乎隐含了另外一种意思，你是不是把广场意识高涨视为文化高潮的征兆？这可能是一种误解。其实，真正的文化高潮是否到来，与一个知识分子能否为文化事业作出卓越的贡献，没有必然的关系。或者应该反过来理解，只有大量知识分子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文化建设事业中去，敢作敢为，文化精神普及了，也许才会为下一个真正的文化繁荣的高潮到来创造条件。在资源丰富的城市里，我们盖楼；在荒芜的沙漠里，我们种树。

编辑 屠毅力